chinaXiv:202306.00078v3

中国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养成关系的元分析*

邓献余[1] 王薇[1] 胡传鹏[3] 贾文斌#[1 2]

（1 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 2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培育实验室“杭州师范大学婴幼儿发展与托育实验室”；3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摘　要：为探讨中国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与家庭教养方式之间的关系及其调节机制，本研究对来自 52 篇文献、19642 名被试的 1504 个效应值进行了元分析。结果表明：（1）积极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呈显著正相关，而消极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呈显著负相关；（2）教养方式对健全人格的影响受儿童青少年年龄段的调节，呈“两头小、中间大”的倒 U 型趋势，主要体现为在初高中阶段影响大，在小学和大学阶段影响小。此外，教养方式对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影响还受到子女性别、年代和地区的调节。本研究结果为中国家庭文化背景下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养成与教育提供了科学视角和实证依据。

关键词：家庭教养方式；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元分析；调节效应

1　引言

教育的本质是培养健全人格的人。健全人格也称完美人格、理想人格，是指一个人按照自己设定的人生目标，不断充实自己、发掘自己的潜能，按照自己选择的人生目标不断幸福进取的人(黄希庭， 2017)。人格的健全发展不仅是个体一生能力与智慧、快乐与幸福形成的基础(Friedman & Kern， 2014； Roberts & Yoon， 2022)，更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儿童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迫切要求(苗天长， 2021)。近年来国家相继颁发了多个政策文件，通过加强对心理健康的预防和监控，为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发展保驾护航(俞国良， 琚运婷， 2018； 俞国良， 张亚利， 2020)。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儿童青少年人格的形成与发展和周围环境密不可分，会受到家庭、同伴、学校、社区、地域和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Bronfenbrenner， 2005)，其中，父母作为与儿童最早且直接的互动者，其教养观念和教养行为对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形成有

*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年度重点课题（2021SB020）和杭州师范大学省优势特色学科培育项目(20JYXK017)资助。

#通讯作者：贾文斌，Email: jiawenbin@hznu.edu.cn

着极为重要的影响(Shiner et al., 2021; Shiner & Caspi, 2003)。众多学者探讨了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青少年人格发展的影响，研究结论却并不一致。有的研究指出积极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呈显著正相关，消极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呈显著负相关(Schofield et al., 2012; Xie et al., 2016; 周春云, 2018)，也有研究指出二者关系不存在显著相关(Li, 2021; 王江洋, 2006)，还有研究表明消极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呈显著正相关(路静, 2013)。因此，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发展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是否会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和影响成为了亟需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此外，中国是集体主义文化，与西方的个体主义文化不同，往往要求孩子服从权威，尊敬长辈(Guan & Li, 2017; Markus & Kitayama, 1998)，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青少年人格发展的影响可能也会有着本土文化下的独特机制(Cheung & Lim, 2022)，因此，本研究的对象着眼于中国儿童青少年。基于此，本研究采用元分析的方法探讨中国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对二者关系产生影响的调节变量，以期为我国家庭教育提供更为科学的研究结果和参考依据。

1.1 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的概念及其测量

健全人格是生物进化所赋予人的本性在充分发挥时所能达到的境界，是各种积极人格的完美整合(黄希庭, 郑涌, 2014)。由于儿童青少年的各种生理和心理机能仍处于不断形成和动态发展过程中，因此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是指人格结构中具有普遍性和积极适应性的典型人格特质的稳定、健康、均衡的发展(杨丽珠 等，2015,2019)。

关于健全人格的测量，研究者主要使用以下两类工具。第一类工具是国内学者杨丽珠等人根据健全人格内涵以及大样本研究发展出来的专用于测量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工具，包括《小学儿童人格他评量表》和《初中生人格评定量表》，两个问卷尽管面向不同年龄段的群体，但健全人格的维度大体相同，分为智能特征、认真自控、外倾性、亲社会性、情绪稳定性五个维度，均有着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杨丽珠, 2015)。第二类工具是以现代西方人格理论为基础发展而成的人格测评量表，其中，以五因素模型为基础的大五人格测验(McCrae et al., 2005)使用最为广泛，具有跨文化、跨情景的高度一致性和稳定性(Minkov et al., 2019; Rammstedt et al., 2010)。五因素模型将人格划分为开放性、神经质、责任性、外倾性以及宜人性等五种特质，和前面用于测量健全人格的五个维度结构相似，内涵也较为相近(杨丽珠 等, 2017)，其中文版由罗杰和戴晓阳(2015)修订，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有着广泛应用(罗杰 等, 2016)，因此，本研究将大五人格测验纳入本元分析。

chinaXiv:202306.00078v3

此外，艾森克人格测验(Eysenck et al., 1985)和卡特尔 16 种人格因素测验(Cattell, 1943)也常被研究者用来进行人格特质方面的研究。艾森克人格测验包括神经质、精神质、外倾性和掩饰性四个维度，其中文版由陈仲庚等人(1983)修订。卡特尔 16 种人格因素测验包含乐群性、聪慧性、稳定性等 16 种人格特质，其中文版由戴忠恒与祝蓓里(1988)修订，以上修订的量表均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研究表明，艾森克人格测验及卡特尔 16 种人格因素测验均与大五人格测验的维度存在着相当大的因子共性(Linden et al., 2012; Zawadzki & Strelau, 2010)，且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亦有着广泛应用，因此，这两个测验也被纳入本研究。为了方便进行元分析，本研究采用大五人格模型整合不同量表的维度，以便得到最合理且可靠的健全人格模型。

1.2 家庭教养方式的概念及其测量

家庭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是父母在与子女沟通过程中，对子女进行教育行为所形成的情感氛围，是父母对子女的一种方向性态度(Darling & Steinberg, 1993)。家庭教养方式有不同的划分类型，较为经典的是 Baumrind(1967)依据父母对子女提出要求程度的不同，将家庭教养方式分为权威型、专制型和放纵型三种。之后，Maccoby 和 Martin 等人(1983)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父母对子女支持的维度，由此形成高要求高支持的权威型、高要求低支持的专制型、低要求高支持的放纵型和低要求低支持的忽视型。

随着研究者对家庭教养方式的日益关注，涌现出许多测量家庭教养方式的工具，其中应用较为广泛的是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gna Minnen Beträffande Uppfostran，EMBU)，该量表由 Perris 等人(1980)从父母促进孩子社会化行为的角度进行编制，包括父母亲教养方式两个分量表。父亲分量表包括情感温暖与理解、惩罚与严厉、过分干涉、偏爱被试、拒绝与否认和过度保护六个维度；母亲分量表包括情感温暖与理解、惩罚与严厉、过分干涉与过度保护、拒绝与否认和偏爱被试五个维度。EMBU 中文版由岳冬梅等人(1993)修订，有良好的信效度，是测量中国家庭教养方式的最主要工具(谢云天 等, 2022)。此外，父母权威量表（The Parental Authority Questionnaire，PAQ）和父母养育方式量表(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PBI)也被研究者大量使用。PAQ 由 Buri 等人(1991)编制，包括专制型、放任型和民主型三个维度。PBI 由 Parker 等人(1979)编制，包含关爱、鼓励自主和控制三个维度。PAQ 和 PBI 已由周亚娟等人(2010)和杨红君等人(2009)修订为中文版，均有着良好的信效度。为了方便进行元分析，本研究借鉴雷丽丽等人(2020)的研究，将家庭教养方式整合为积极教养方式和消极教养方式。在积极教养方式下，父母与孩子之

chinaXiv:202306.00078v3

间是一种温暖与支持的积极关系，其对儿童的发展起着保护性的促进作用；消极教养方式则是否认拒绝、惩罚定向或过度保护的态度及行为，不利于儿童健全人格的发展(Jugert et al., 2016)。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将家庭教养方式具体划分为温暖与支持性（积极教养方式）、专制与严厉性以及溺爱与纵容性（消极教养方式）三个维度，并将 EMBU、PBI、PAQ 等量表的维度整合纳入。

1.3 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关系及影响因素

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Kitamura et al., 2009; Schofield et al., 2012)。研究发现，受到父母虐待的儿童相比未受虐待的儿童表现出较低的宜人性、责任心和开放性以及较高的神经质(Rogosch & Cicchetti, 2004)，而积极教养方式下的儿童表现出更高的宜人性、责任心以及更低的神经质(Schofield et al., 2012)。在以中国被试群体为研究对象的结果亦发现积极教养方式与大五人格中的外倾性、宜人性、责任性、开放性呈显著正相关，与神经质呈显著负相关，消极教养方式如专制与严厉、溺爱与纵容等，与人格维度的外倾性、宜人性、责任性、开放性呈显著负相关，与神经质呈显著正相关(钱铭怡，夏国华, 1996; 余照照, 秦亚平, 2015; 周春云, 2018)。但是也有部分研究发现，如纵容型的教养方式与宜人性、开放性呈弱相关甚至不相关(王江洋, 2006; 杨青, 2004)，而专制型的教养方式与开放性呈显著正相关(路静, 2013)。可见，在已有的关于家庭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的研究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这表明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的健全人格的关系虽然存在但并不稳定，其可能是受到多重调节变量影响的结果。因此，本研究除了探讨教养方式和健全人格二者的关系外，还将采用元分析的方法整合相关领域众多研究，识别影响二者之间关系的调节因素，进一步明确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之间关系出现不一致的原因，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首先，父母角色的调节作用。父亲更多采用专制、管束的教养方式，而母亲更多采用耐心、温和的教养方式(Berndt et al., 1993)。受“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影响，母亲是孩子主要的照顾者，孩子常会通过母亲来理解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情，并形成自己的解释风格(Burns & Seligman, 1989)，所以母亲可能比父亲对孩子的影响更大(Pinquart, 2016)。基于此，本研究假设父母角色在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之间起着调节作用。

其次，儿童性别的调节作用。根据教养方式过程模型(Belsky,1984)，由于性别社会角色不同，儿童从小在玩具游戏选择、衣着打扮、家务分工以及行为规范上也会有所不同，

chinaXiv:202306.00078v3

如父亲对于女孩会给与更多的鼓励，而对于男孩则会给与更多的干涉和拒绝(徐鑫锫 等, 2022; 岳鹏飞 等, 2022; 赵纤 等, 2023)。因此，本研究假设性别特征将调节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之间的关系。

再次，儿童年龄段的调节作用。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受到父母影响减少，转而与同伴和教师建立起亲密关系(Kitamura et al., 2009; 谢云天 等, 2022)。孩子的人格在家庭中形成并带入其他环境中继续发展，家庭的作用则相对下降(Richards, 1981)。由此，本研究假设年龄段也可能会调节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二者的关系。

最后，研究所处年代和地区的调节作用。时代的变迁和地区的社会文化经济水平可能会影响父母的教育观念和家庭教养方式。一方面，家庭教育曾被认为是母亲的职责，如今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逐渐凸显，家庭教育开始转变为父母共同的职责(伍新春 等, 2012)；另一方面，我国东部地区的父母在情感温暖教养方式使用上显著高于西部地区，而在惩罚严厉上显著低于西部地区(张祎, 2011)，因此，本研究假设研究所处年代和地区也可能会调节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之间的关系。

综上，本研究旨在通过元分析方法，揭示中国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之间的确切关系，并分析影响二者关系的调节变量。鉴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对家庭教养方式和健全人格及其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Chao, 1994; Fan, 2021; LeVine, 1974)，本研究立足于中国文化和被试，探讨中国家庭教养方式和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之间的关系。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两个假设：（1）中国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发展存在显著相关；（2）父母角色、子女性别、年龄段、年代、地区等因素可能对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发展起着调节作用。本研究参照开放式元分析的规范化报告流程进行(刘宇 等, 2021)。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检索

本研究全面检索了 1993 年 1 月到 2022 年 6 月期间中文和英文文献有关家庭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的研究，2022 年 12 月进行了二次更新。中文文献主要检索 CNKI 数据库、维普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等，检索词为“家庭教养方式”、“家庭养育方式”、“父母教养方式”、“父母养育方式”、“父亲教养方式”、“母亲教养方式”、“健全人格”、“人格”等; 英文数据库包括“Web of Science”、

chinaXiv:202306.00078v3

“PubMed”、“Google Scholar”、“Springer Link”、“Elsevier SD”、“EBSCO”、“OvidSP”、“Wiley Online Library”、“ProQuest”等，以“Parenting Style”、“Parenting”、“Parental Rearing Behaviour”、“Rearing Style”、“Personality”、“China”、“Chinese”为关键词组合进行检索。为了避免遗漏，还对文章的参考文献进行人工检索。初步检索之后共得到相关文献 1353 篇。

2.2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结合以往研究和本研究主题，纳入元分析研究的文献筛选标准为：（1）研究必须是关于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二者关系的实证研究，数据完整，样本大小明确；（2）被试为中国样本，或者在中外混合样本中提供了中国样本家庭教养方式和健全人格的相关数据；（3）所涉及的被试为典型发展群体，排除精神障碍等其他非典型发展群体；（4）文献中所涉及的数据非重复使用，若已发表的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使用相同数据，则选择期刊论文；（5）研究明确地报告了家庭教养方式和健全人格的测量方式；（6）研究包括了父母教养方式量表中至少一个维度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的相关系数或其他可以转化为效应量的指标。最后，获得符合标准的文献 52 篇，其中中文文献 49 篇，英文文献 3 篇，获得 1504 个效应量，样本总量为 n=19642。文献检索、筛选、纳入和排除流程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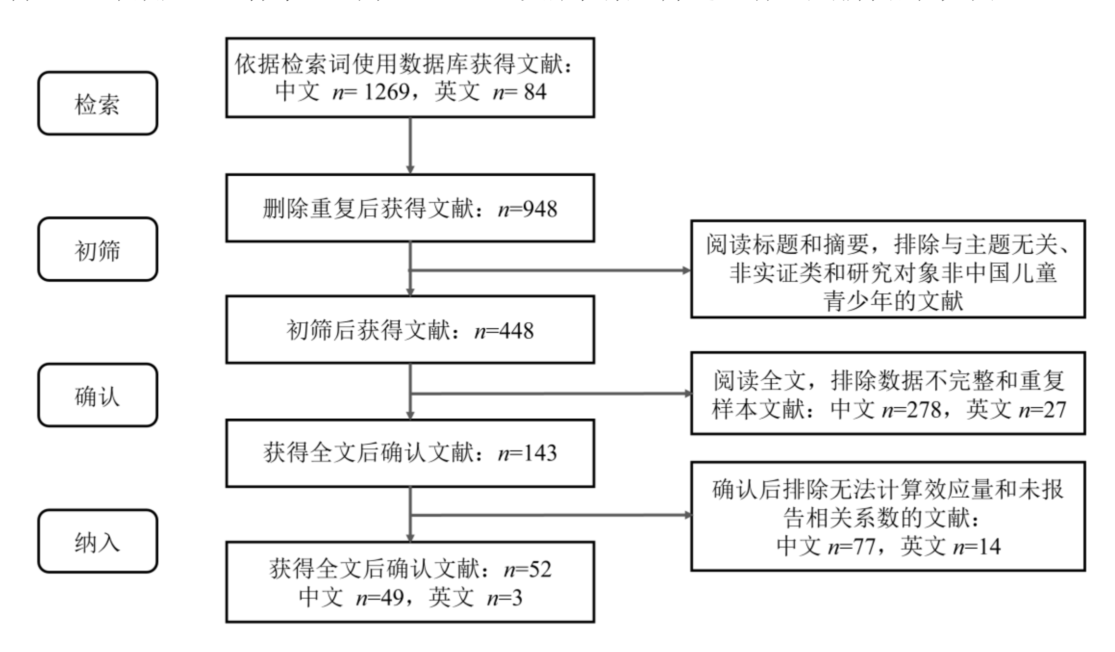


图 1 文献检索与筛选流程图

2.3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根据所要探讨的问题对纳入元分析的文献数据进行如下编码（表 1）：（1）第一作者姓名和发表年份；（2）样本量；（3）性别比例；（4）年龄阶段；（5）教养方式量表；（6）健

chinaXiv:202306.00078v3

全人格量表；（7）是否区分父母角色；（8）地区。文献编码由两位评分者独立完成，对不一致的文章进行协商后达成统一，最终的一致性系数为 0.91，表明文献编码是比较准确的。最后，依据中国家庭教育“五年计划”的两个重要时间节点（1996 年和 2007 年），将年代划分为阶段 1：1996-2011；阶段 2：2012-2021(谢云天 等, 2022)。

2.4 数据处理与分析过程

本研究采用元分析软件包 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 3.0 (Borenstein et al., 2009)进行分析，以 Person 相关系数 r 计算效应量，通过 Fisher Z 转换 r 值。部分文献汇报了 t 值、F 值、χ^2 值，通过相关公式将其转化为 r 值后再纳入分析（丁凤琴，2016）。本研究通过 I^2 和 τ^2 反映效应大小异质性，一般认为 I^2 大于 50 则存在显著异质性，并以 Q 检验量检验 τ^2 的显著性(Borenstein et al., 2009)。在效应模型的选择上，由于纳入本研究文献中的被试群体涵盖小学、中学和大学，居住地涉及城市和农村，用于测量健全人格和教养方式的工具也不完全相同，因此本研究关于效应量的计算以及调节变量的分析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对于性别的调节效应，由于纳入元分析的大部分文献没有汇报不同性别的家庭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的相关系数，故采用性别比（女性比）作为调节变量进行分析，又因性别比属于连续型变量，故采用元回归的方式进行分析(李松 等, 2019)。出版偏倚采用失安全系数 N_{fs} 和漏斗图检验，一般认为 N_{fs} 大于 $5k+10$，漏斗图基本呈对称趋势则研究受到出版偏倚影响较小，若失安全系数检验与漏斗图检验结果不同，则采用 Egger’s 回归检验，当截距显著性大于 0.05 时，出版偏倚可以忽略(Cooper, 2016)。

表 1 纳入元分析的文献的特征编码

序号	作者，年份	年段	样本量	女性比（%）	教养方式量表	健全人格量表	年代	是否区分父母	地区
1	杨青，2004	小学	352	缺失	EMBU	EPQ	阶段 1	+	广东
2	王江洋，2006	初中	60	0	EMBU	EPQ	阶段 1	+	辽宁
3	杨梅菊，2007	初中	156	0.43	EMBU	EPQ	阶段 1	+	湖北
4	许思安等，2007	小学	179	0.51	EMBU	QZPASS	阶段 1	+	云南
5	赵冬菊，2001	小学	100	0.47	EMBU（无偏爱因子）	EPQ	阶段 1	+	河南
6	姚梅玲，2007	小学	1015	0.51	EMBU	EPQ	阶段 1	+	河南
7	刘青，2008	高中	183	0.43	EMBU	EPQ	阶段 1	+	安徽
8	杜宇锋等，2008	初中	288	0.47	EMBU	EPQ	阶段 1	+	上海
9	黄树香，2010	初中	276	0.52	EMBU	EPQ	阶段 1	+	广西
10	黄树香等，2011	初中	222	0.55	EMBU	EPQ	阶段 2	+	—
11	王冬梅等，2011	初中	315	0.49	EMBU	EPQ	阶段 2	+	内蒙古
12	于颖慧等，2012	高中	272	0.59	EMBU	EPQ	阶段 2	+	江苏
13	姜梦，2014	高中	123	0.47	EMBU	EPQ	阶段 2	+	黑龙江

chinaXiv:202306.00078v3

14	汪小琴等，2014	初高中	650	1	EMBU	EPQ	阶段 2	+	江西
15	张磊等，2016	初中	307	缺失	EMBU	EPQ	阶段 2	+	山东
16	吴晋芸，2020	初高中	824	0.51	EMBU 简版	CBF-PI-B	阶段 2	+	福建，河北
17	王明杰，2019	小学	451	0.51	EMBU	EPQ	阶段 2	+	河北
18	周春云，2018	高中	475	0.54	EMBU	NEO-FFI	阶段 2	+	四川
19	李莉，2017	高中	705	0.61	EMBU	EPQ	阶段 2	+	云南
20	路静，2013	初高中	968	0.56	EMBU	NEO-PI-R	阶段 2	+	河南
21	史广红，2012	高中	651	0.53	EMBU	EPQ	阶段 2	+	山西，江苏
22	张艳清，2010	初中	482	0.56	EMBU	EPQ	阶段 1	+	吉林
23	张龙真，2006	高中	503	0.57	EMBU	EPQ-RSC	阶段 1	+	河南
24	李菁，2014	高中	46	缺失	EMBU	EPQ	阶段 2	+	重庆
25	张建新等，2007	高中	30	1	EMBU	NEO-PI-R&CPAI	阶段 1	+	北京
26	王中会等，2006	初高中	637	0.53	EMBU	CPAI	阶段 1	+	湖南，四川，福建，北京
27	Weiqiao Fan,2021	小学	722	0.53	CRPR	CPAI	阶段 2	+	上海
28	Qiuzhi Xie，2016	初中	718	0.57	PAQ	CPAI	阶段 2	+	上海，广东
29	Li Mengting，2021	初中	710	0.53	PAQ	CPAI	阶段 2	+	上海
30	王竹燕，2012	高中	392	0.55	EMBU 简版	EPQ-RSC	阶段 2	-	天津
31	张成镐，2010	大学	184	0.78	EMBU	EPQ	阶段 1	+	吉林
32	周雪雪等，2012	大学	161	缺失	EMBU	EPQ-RSC	阶段 2	+	河北
33	徐雪萍等，2009	大学	199	0.72	EMBU	EPQ	阶段 1	+	重庆
34	赵荣荣等，2017	大学	449	0.9	PBI	EPQ-RSC	阶段 2	+	天津
35	张改叶等，2006	大学	233	0.52	EMBU	EPQ	阶段 1	+	河南
36	曾昱，2012	大学	245	0.7	EMBU	EPQ-RSC	阶段 2	+	福建
37	黄美玲等，2016	大学	208	缺失	EMBU	EPQ-RSC	阶段 2	+	江西
38	邓昭财，2020	大学	100	0.5	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龚艺华编）	NEO-FFI	阶段 2	-	云南
39	廉新异等，2020	大学	129	0.54	EMBU	EPQ	阶段 2	+	黑龙江
40	吴均林等，2005	大学	49	0.27	EMBU	EPQ	阶段 1	+	湖北
41	谢盈，2018	大学	510	0.42	EMBU	CBF-PI-B	阶段 2	-	黑龙江
42	钱铭怡等，1996	高中	79	0.41	EMBU	EPQ	阶段 1	+	北京
43	李国华等，2003	大学	815	0.65	EMBU	EPQ	阶段 1	+	内蒙古
44	张静等，2011（蒙）	大学	389	0.58	EMBU（无偏爱因子）	EPQ	阶段 2	+	内蒙古
45	张静等，2011（汉）	大学	333	0.46	EMBU（无偏爱因子）	EPQ	阶段 2	+	内蒙古
46	张喜艳，2008	大学	445	0.47	EMBU	EPQ	阶段 1	+	湖南
47	王号，2017	小学	280	0.5	EMBU	NEO-PI-R	阶段 2	-	上海
48	张迅等，2016	大学	152	0.84	EMBU	EPQ-RSC	阶段 2	-	浙江
49	陈恺盛等，2016	大学	176	缺失	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龚艺华编）	EPQ	阶段 2	-	山东
50	左晓阳，2018	大学	1022	0.39	EMBU	EPQ	阶段 2	+	安徽
51	何欣彤 2016	大学	361	0.53	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龚艺华编）	EPQ-RSC	阶段 2	-	吉林

chinaXiv:202306.00078v3

52	曹婕，2012	小学	311	0.55	EMBU	EPQ	阶段 2	+	西安

注：（1）“+”代表文献提供相应数据，“-”代表文献未提供相应数据。（2）a 和 b 代表同一研究的不同样本。（3）EMBU 指 Perris（1980）所编家庭教养方式评价量表，标准版为岳冬梅等人修订的中文版，简版为蒋奖等人修订的中文简化版，CRPR 为儿童父母行为量表。QZPASS 为中国人人格形容词评定量表简表，CBF-PI-B 为王孟成编订的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版，NEO-FFI 为大五人格简式量表，CPAI 为中国人个性量表，EPQ 为艾森克人格量表，中文版为陈仲庚等人修订，EPQ-RSC 为艾森克人格简式量表中文版。（4）阶段 1 为 1993-2010 年，阶段 2 为 2011-2020 年。

3 研究结果

3.1 出版偏倚检验

本研究主要通过失安全系数、漏斗图、Egger’s 线性回归系数来检验研究的出版偏倚。如表 2 所示，除了专制与严厉性和开放性维度外，其他教养方式和健全人格维度之间的失安全系数远大于临界值 $5k+10$，且漏斗图基本呈对称趋势，说明不存在明显出版偏倚。对于专制与严厉性和开放性维度二者关系，虽然失安全系数较低（N_{fs}=166），但漏斗图基本对称（图 2），文献基本分布在漏斗图的上方，计算 Egger’s 回归系数，发现截距为-0.139（p=0.899）。综上所述，本研究纳入的文献整体上不存在明显的出版偏倚，元分析的结果是可靠的。

图 2　专制与严厉和开放性漏斗图

3.2 主效应检验

家庭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的主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积极教养方式（情感与支持

chinaXiv:202306.00078v3

性）与健全人格的五个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ps<0.001$），消极教养方式中的专制与严厉性与健全人格五个维度呈显著负相关（$ps<0.01$），消极教养方式中的溺爱和纵容性与健全人格的情绪稳定性和宜人性呈显著负相关（$ps<0.001$）。异质性检验发现，家庭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所有维度的 I^2 均大于 50%，Q 值达到显著水平（$p<0.01$），说明研究间异质性较高，同时 τ^2 值表明研究间存在一定比例的变异可用于计算权重，这表明研究间的差异受到了调节变量的影响，应进行调节效应分析(Cooper, 2016)。

表 2　家庭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的主效应 meta 分析

教养方式	健全人格	k	r[95 %CI]	异质性检验 Q	df	I^2	τ^2	N_{fs}
情感与支持性	开放性	17	0.226[0.176, 0.274]***	95.29***	16	83.21	0.009	2110
	情绪稳定性	92	0.173[0.153, 0.193]***	314.71***	91	71.08	0.006	22596
	责任性	17	0.318[0.278, 0.358]***	70.36***	16	77.26	0.006	4131
	外倾性	93	0.171[0.147, 0.195]***	482.72***	92	80.94	0.011	23404
	宜人性	97	0.192[0.164, 0.219]***	721.98***	96	86.70	0.016	33869
专制与严厉性	开放性	25	-0.054[-0.090, -0.018]**	91.64***	24	73.81	0.005	166
	情绪稳定性	167	-0.191[-0.214, -0.168]***	1395.47***	166	88.10	0.020	85231
	责任性	26	-0.134[-0.163, -0.104]***	71.88***	25	65.22	0.004	1495
	外倾性	168	-0.036[-0.053, -0.018]***	719.26***	167	76.78	0.009	2887
	宜人性	169	-0.226[-0.249, -0.203]***	1516.97***	168	88.93	0.021	121016
溺爱与纵容性	开放性	28	0.034[-0.006, 0.073]	140.85***	27	80.83	0.008	—
	情绪稳定性	195	-0.123[-0.140, -0.106]***	975.02***	194	80.10	0.011	47655
	责任性	28	-0.009[-0.038, 0.020]	74.62***	27	63.82	0.003	—
	外倾性	196	0.006[-0.009, 0.020]	689.89***	195	71.74	0.007	—
	宜人性	198	-0.113[-0.133, -0.092]***	1504.65***	197	86.91	0.018	37928

注：* $p<0.05$，** $p<0.01$，*** $p<0.001$（下同）。

3.2 调节效应检验

3.2.1 年龄段的调节效应

如图 3 所示，在积极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关系中，年龄段的调节效应显著，二者的关系随着学段年龄的增加呈“倒 U 型”趋势。具体而言，年龄段对情感与支持性和健全人格情绪稳定性维度的调节效应达到显著水平（Q-between=59.93, $p<0.001$），其中，小学（r=0.151）和大学（r=0.136）的效应量较小，而初中（r=0.263）、初高中（r=0.172）和高中（r=0.157）阶段的效应量较大；年龄段对情感与支持性和健全人格宜人性维度的调节效应亦达到显著水平（Q-between=18.78, $p<0.001$），其中，小学（r=0.201）、高中（r=0.128）和大学（r=0.176）的效应量较小，而初中（r=0.238）和初高中（r=0.272）阶段的效应量较大；年龄段对情感与支持性和健全人格开放性维度的调节效应边缘显著（Q-between=9.07, p=0.06），其中，小学（r=0.187）、高中（r=0.127）和大

chinaXiv:202306.00078v3

学（r=0.131）的效应量较小，而初中（r=0.218）和初高中（r=0.290）阶段的效应量较大。

在两种消极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关系中，年龄段亦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亦呈“倒 U 型”趋势。具体来讲，年龄段对专制与严厉性和健全人格开放性维度的调节效应显著（Q-between=11.87, p<0.05），其中，高中（r=-0.122）阶段的效应量最大，小学（r=-0.003）、初中（r=-0.09）、初高中（r=-0.008）和大学（r=-0.051）的效应量较小；年龄段对专制与严厉性和健全人格宜人性维度的调节效应显著（Q-between=34.49, p<0.001），其中，初中（r=-0.293）和初高中（r=-0.247）阶段的效应量较大，小学（r=-0.175）、高中（r=-0.191）和大学（r=-0.218）阶段的效应量较小。消极教养方式中溺爱与纵容性和健全人格情绪稳定性维度的关系也受到年龄段的调节（Q-between=8.69, p=0.07），其中，初中（r=-0.121）、初高中（r=-0.172）和高中（r=-0.145）阶段的效应量较大，小学（r=-0.102）和大学（r=-0.103）阶段的效应量较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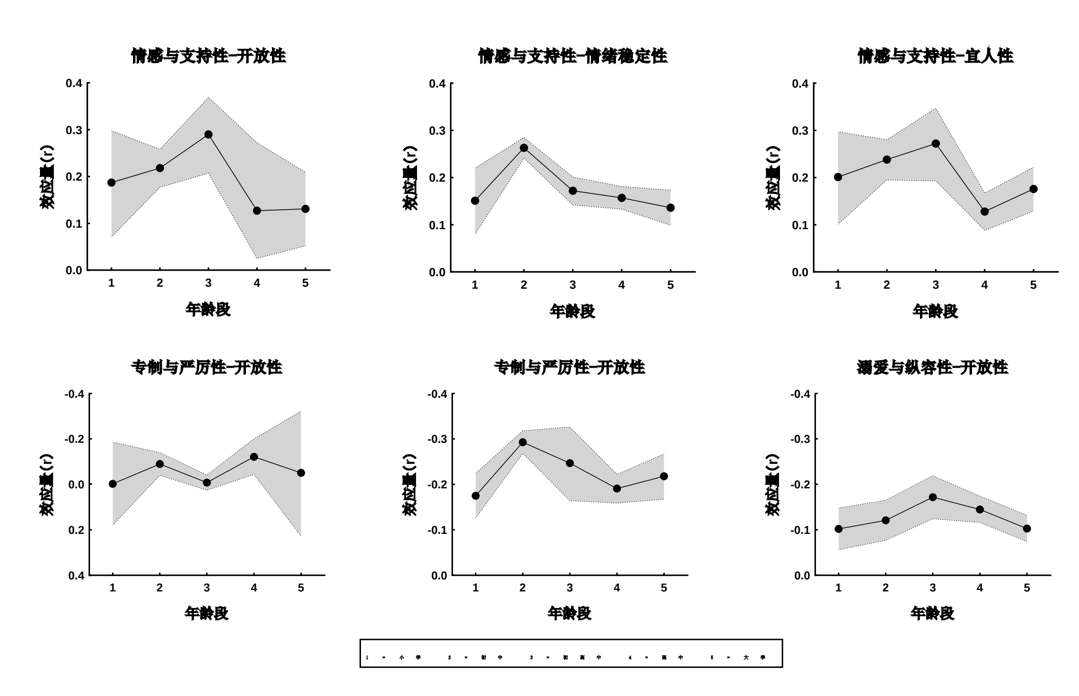


图 3　年龄段对父母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3.2.2 年代、地区和父母角色的调节效应

年代和地区对于父母教养方式和健全人格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有着显著的调节效应（详见表 3）。对于年代而言，其对消极教养方式中专制与严厉性和健全人格的情绪稳定性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显著（Q-between=7.09, p<0.01），阶段 1 的效应量显著高于阶段 2，即随着年代的变迁，二者的负相关程度显著减弱。对于专制与严厉性和健全人格的责任性，年代同样显著调节了两者的关系（Q-between=7.83, p<0.01），即随着年代的变迁，二者的

chinaXiv:202306.00078v3

负相关程度显著减弱。对于地区而言，其对积极教养方式（情感与支持性）与健全人格的责任性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显著（Q-between=7.84,$p<0.01$），东部地区的效应量显著低于西部地区。另外，对于父母角色，其对教养方式和健全人格之间所有维度之间的关系均不存在显著调节作用。

表 3　家庭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的调节效应分析

亚组	调节变量		N	r[95%CI]	Q_b	p
情感与支持性-开放性	年龄段	小学	1	0.187[0.071,0.298]		
		初中	4	0.218[0.177,0.258]		
		初高中	6	0.290[0.207,0.369]		
		高中	4	0.127[0.025,0.272]		
		大学	2	0.131[0.052,0.209]		
		总			9.07	0.06
情感与支持性-情绪稳定性	年龄段	小学	9	0.151[0.080,0.220]		
		初中	20	0.263[0.241,0.285]		
		初高中	8	0.172[0.142,0.201]		
		高中	21	0.157[0.133,0.181]		
		大学	34	0.136[0.099,0.173]		
		总			59.93^{***}	<0.001
情感与支持性-宜人性	年龄段	小学	12	0.201[0.101,0.297]		
		初中	22	0.238[0.195,0.280]		
		初高中	8	0.272[0.193,0.347]		
		高中	21	0.128[0.088,0.167]		
		大学	34	0.176[0.129,0.222]		
		总			18.78^{***}	<0.001
专制与严厉性-开放性	年龄段	小学	2	-0.003[-0.186,0.180]		
		初中	4	-0.090[-0.139,-0.041]		
		初高中	9	-0.008[-0.041,0.026]		
		高中	8	-0.122[-0.200,-0.044]		
		大学	2	-0.051[-0.322,0.228]		
		总			11.87^{*}	<0.05
专制与严厉性-宜人性	年龄段	小学	17	-0.175[-0.224,-0.126]		
		初中	38	-0.293[-0.318,-0.268]		
		初高中	14	-0.247[-0.326,-0.164]		
		高中	41	-0.191[-0.222,-0.159]		
		大学	59	-0.218[-0.267,-0.167]		
		总			34.49^{***}	<0.001
溺爱与纵容性-情绪稳定性	年龄段	小学	20	-0.102[-0.148,-0.056]		
		初中	42	-0.121[-0.165,-0.077]		
		初高中	17	-0.172[-0.219,-0.124]		
		高中	49	-0.145[-0.174,-0.116]		
		大学	67	-0.103[-0.132,-0.074]		
		总			8.69	0.07
专制与严厉性-情绪稳定性	年代	阶段 1	71	-0.230[-0.272,-0.188]		
		阶段 2	96	-0.163[-0.189,-0.138]		
		总			7.09^{**}	<0.01
专制与严厉性-责任性	年代	阶段 1	8	-0.190[-0.226,-0.153]		
		阶段 2	18	-0.118[-0.152,-0.084]		
		总			7.83^{**}	<0.01
情感与支持性-责任性	地区	东部	10	0.286[0.261,0.311]		
		西部	5	0.395[0.324,0.462]		
		总			7.83^{**}	<0.01

注：（1）年龄段：小学，初中，初高中，高中，大学；（2）年代：阶段 1（1996-2011）阶段 2（2012-2021）；（3）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

chinaXiv:202306.00078v3

3.2.3 子女性别的调节效应

为检验家庭教养方式和健全人格的关系是否受到子女性别（女性比）的调节作用，以性别为协变量纳入元回归模型。结果如表 4 显示，子女性别显著调节了积极教养方式和健全人格开放性的关系，随着女性比例的上升，积极教养方式与开放性的正相关程度显著下降。同时，子女性别还显著调节了消极教养方式和健全人格中宜人性的关系，随着女性比例的上升，两种消极教养方式和健全人格宜人性的负相关程度均显著上升。

表 4 性别对家庭教养方式和健全人格关系的 Meta 回归分析

维度	协变量	Coefficient(95%CI)	SE	z	Q-model
情感-开放性	β_0	0.568（0.244，0.892）	0.166	3.43	0.04*
	β_1	-0.624（-1.214，-0.035）	0.301	-2.08	
专制-宜人性	β_0	-0.109(-0.196，-0.022)	0.045	-2.45	6.54*
	β_1	-0.199(-0.352，-0.045)	0.078	-2.56	
溺爱-宜人性	β_0	-0.032(-0.111，0.047)	0.040	-0.73	4.25*
	β_1	-0.147(-0.286，-0.007)	0.071	-2.13	

4 讨论

4.1 家庭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的关系

本研究通过对 52 篇文献共 19642 个样本进行元分析后，发现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积极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五个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消极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呈显著负相关，专制与严厉性作为一种高要求低支持型的教养方式对健全人格的养成影响较为全面，而低要求高支持性的溺爱与纵容型的教养方式则主要影响健全人格的情绪稳定性与宜人性两个方面，这表明不同的教养方式对人格发展的影响大不相同(Asanjarani et al., 2022; Ayoub et al., 2021)。根据生态系统理论，每个个体都是处于多维度多层次的社会生态系统之中，父母作为最早作用于个体成长的微系统，对个体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Bronfenbrenner & Morris, 2007)。当父母对子女采取有一定要求且能够给与恰当支持的教养方式时，子女健全人格发展的最好，而当父母对子女没有要求或不能给与支持时，子女的健全人格则不能良好发展，这和前人大部分研究结果相一致(董梦妍 等, 2020; 蒋敏慧 等, 2017; 彭顺 等, 2019; 孙岩 等, 2016; 田良臣, 袁青, 2019; 张建人 等, 2021)，也和已有的关于家庭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中一些维度的元分析结果相吻合(Dong et al., 2022; Lei et al., 2018; Pinquart & Gerke, 2019; Wong et al., 2021)。

chinaXiv:202306.00078v3

分析心理学认为，支持个体走向自性化和完整人格的前提是需要提供一个自由、受保护而有边界的空间，自由与受保护使得个体在这个空间里有安全感，进而可以积极探索并发展自我，在教养方式中体现为父母能够在感情上接纳、理解子女，能积极回应和恰当满足子女的需求，而边界则让个体知晓行为规则的重要性，在教养方式中则体现为较为严格的行为要求，由此方能滋养个体健全人格和谐而平衡地发展(申荷永 等, 2005)。从研究结果中可以看到，如果仅仅一味地给与支持而没有要求，甚至纵容，会导致儿童青少年形成一种非常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对于家庭、学校以及社会中的一些规则熟视无睹，极少进行自我控制，亦很难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移情共情能力较差，其情绪稳定性和宜人性也就下降了(单志艳 等, 2017; 贾立茹 等, 2019; 刘文婧 等, 2012; 孙岩 等, 2015)。对于专制与严厉性的教养方式，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到对健全人格发展的影响更为全面，和五个维度均呈负相关，这表明对于儿童青少年的发展，给与他们自由与受保护的空间是极为重要的(刘拓 等, 2021; 童星, 2020; 张小菊, 赵敬, 2013)。父母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应多采用理解与支持的方式，营造温暖舒适的家庭氛围，给孩子一个自由、受保护而有边界的空间，从而让孩子发展出健全完善的人格。

4.2 家庭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的调节效应

首先，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年龄段对家庭教养方式和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在多个维度上达到显著水平。具体表现为初中或初高中年龄段中家庭教养方式对孩子健全人格的发展影响较为显著，而在小学、高中和大学年龄段影响较弱，整体呈倒“U”型。这和以往元分析研究结果一致，如年龄段会调节家庭教养方式和儿童青少年学业成绩、拖延行为、情绪调节、社会情感能力乃至自杀意念等之间的关系(高峰 等, 2023; 雷丽丽 等, 2020; 童星, 2020; 谢云天 等, 2022; Li et al., 2021)。根据群体社会化理论，儿童在家庭内的习得行为和在家庭外的习得行为是两个独立的系统。随着儿童的长大，家庭外的行为系统会逐渐取代、超越家庭内的行为系统，最终成为其人格的后天习得部分(Harris, 1995)。小学初中阶段，子女的主要活动场所是家庭，因此受到家庭教养的影响直接且广泛，而在子女上了高中和大学之后，一方面大部分孩子会住校，另外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周围的生态系统也越趋复杂，家庭的影响就会相对减弱，而受到教师和同伴的影响会逐渐增大(高峰 等, 2023)。对于小学阶段的调节效应小于初中阶段，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小学时期的儿童诸多认知与社会性发展尚未成熟(杨丽珠 等, 2019)，因此家庭教养方式影响的效应尚未充分显现；另一方面，初中阶段处于人格成长的“疾风骤雨”期，

chinaXiv:202306.00078v3

chinaXiv:202306.00078v3

生理与心理状态的快速变化会将家庭教养方式的效应放大，当父母采用惩罚或严厉等消极教养方式时，会加剧人格中不稳定性因素的显露(张亚利 等, 2022)，导致与父母的冲突加剧(Branje et al., 2012)。如果家庭能够给与孩子充分的理解与接纳，更多的情感支持与引导，则会帮助孩子更加开放宜人，情绪情感稳定，进而促进健全人格的养成。

其次，年代对家庭教养方式和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之间关系的有影响，体现在专制与严厉性的教养方式和情绪稳定性及责任性上，年代阶段 2（2012-2021）的负相关显著弱于阶段 1（1996-2011）。前人的元分析研究也得出类似结果，即随着年代的变化，消极教养方式与学业成绩的负相关程度减弱(谢云天 等, 2022)。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变迁，父母对家庭教育越来越重视，父母意识到理解和支持的教育方式更能让孩子健康成长(贾刚 等, 2015)。与此同时，随着国家大力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学校的育人环节对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并取得一定成效(吕玉刚, 2022)，也就体现为家庭消极教养方式对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影响随着年代的发展而减弱。

再次，地区的调节效应在积极教养方式和健全人格的责任性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且西部地区显著高于东部地区。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东西部经济、文化的差异导致父母的教育观不同(胡菲菲, 2008)，西部地区父母可能会因为经济压力更期望通过教育，让孩子能够自力更生，过上更好的生活。在这种思想的长期影响下，对于孩子的责任心和自控力也会产生一定积极作用，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另一方面，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低于东部地区，基础设施不完善，西部地区的孩子更有机会参与生活实践，在劳动中锤炼和发展自己，进而有助于培养责任心和认真自控等积极品格(檀传宝, 2019)。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纳入分析文献的检索范围是从 1993 年 1 月到 2022 年 12 月，在这 20 多年的时间里东西部发展差距在不断缩小，这可能是导致其他维度上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之间关系的地区调节作用不显著的原因。

最后，子女性别也调节着家庭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之间的关系。积极教养方式对子女健全人格开放性维度上的影响在男孩中更大，而消极教养方式对子女宜人性维度上的影响在女孩中更大。这与我国具有几千年农耕文明的社会对于男女性别的不同期待相契合。在儒家文化中，男性被要求应该更加坚强忍耐、要大度宽容，在此方面女性被要求的较少。因此，父母多对男孩施以较为严苛的教养方式，有着更多的干涉和拒绝，而对女孩则会给与更多的温暖和耐性(杨斌芳, 侯彦斌, 2014)，同时，由于女性的神经发育成熟要早于男性，致使女性在健全人格多个维度的得分均高于男性(De Bolle et al., 2015; Li et al.,

2021; Zhang & Wang, 2022)。因此，当父母对男孩施以温暖且支持的积极教养方式时，男孩就会获得更多的自由与受保护的空间，进而拓展了情感丰富、智慧和创造力的特质。当父母对女孩不能给与足够支持和正确引导，施以消极教养方式时，就会影响女孩与他人的共情和协作能力，进而降低了宜人性(张小菊， 赵敬， 2013)。另一方面，受到性别角色的影响，男孩的行为更多取决于自身，而女孩则更容易受到重要他人的影响，如会更多地与父母进行联络、积极互动，也就更容易受到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童星， 2020)。本研究还发现父母角色在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关系中不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说明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如若施以同一种教养方式，对孩子的健全人格发展影响基本一致。

4.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聚焦中国被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中国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并分析了父母身份、子女性别、年龄段、年代和地区的调节效应，验证了部分假设，对于改进家庭教育，促进新时代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培养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

第一，本研究所采用的健全人格定义为西方大五人格模型下的产物，对于健全人格的本土化的研究较少且不成体系，未来的研究应尝试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构建健全人格的定义与理论模型。

第二，元分析是一种对文献查全率要求比较高的研究方法，本研究的聚焦问题是家庭教养方式和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之间的关系，目前对于健全人格尚未有统一定义，不同研究所用工具也不尽相同，因此，文献检索可能并没有涵盖所有研究，此外，在文献的查找过程中还可能会存在着因文献加密或其他个人因素所限而导致部分数据缺失，进而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未来研究可在构建健全人格的操作性定义和具体维度的基础上，再进行文献检索。

第三，以往众多研究表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水平等都会和家庭教养方式交互影响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发展(李骏， 张陈陈， 2021； 刘啸莳， 2021； 卢富荣 等， 2015)，但是本元分析所纳入的文献中大部分没有汇报以上相关信息，未来研究可以尝试将以上变量纳入分析，并进一步探索其他可能的潜在调节变量在家庭教养方式和健全人格关系之间的作用，以便更加全面地揭示家庭教养方式和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发展之间的关系。

5 结论

chinaXiv:202306.00078v3

（1）中国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发展存在密切关系。积极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五个维度的发展均呈显著正相关，消极教养方式中的专制与严厉性与健全人格五个维度的发展均呈显著负相关，溺爱与纵容性与健全人格中的情绪稳定性和宜人性两个维度呈显著负相关。

（2）年龄段对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之间关系的影响较大，整体呈现倒“U”型的趋势，即对初、高中阶段的影响比小学和大学阶段更为明显。此外，子女性别、年代和地区等因素对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之间关系也具有调节效应。

chinaXiv:202306.00078v3

参考文献：

(* 为纳入元分析的文献)

Baumrind, D. (1967). Child care practices anteceding three patterns of preschool behavior. *Genetic Psychology Monographs*, *75*, 43–88.

Belsky, J. (1984). The determinants of parenting: a process model. *Child Development*, *55(1)*, 83–96.

Berndt, T. J., Cheung, P. C., Lau, S., Hau, K.-T., & Lew, W. J. F. (1993). Perceptions of parenting in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Sex differences and societal differenc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9*, 156–164.

Borenstein, M., Hedges, L. V., Higgins, J. P. T., & Rothstein, H. R. (2009). *Introduction to Meta-Analysis*. John Wiley & Sons, Ltd.

Branje, S., Laursen, B., & Collins, W. A. (2012).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during adolescence. 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pp. 271–286). Taylor and Francis - Balkema.

Bronfenbrenner, U. (2005). *Making human beings human: Bioec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human development* (pp. xxix, 306). Sage Publications Ltd.

Buri, J. R. (1991). Parental authority questionnai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57*(1), 110–119.

Burns, M. O., & Seligman, M. E. (1989). Explanatory style across the life span: Evidence for stability over 52 yea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6*, 471–477.

Cattell, R. B. (1943). The description of personality: basic traits resolved into clusters.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38*(4), 476–506.

Chao, R. K. (1994). Beyond parental control and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style: understanding Chinese parenting through the cultural notion of training. *Child Development*, *65*(4), 1111–1119.

Cheung, H. S., & Lim, E. (2022). A scoping review of Singapore parenting: Culture-general and culture-specific functions of parenting styles and practices. *Infant and Child Development*, *31*(4), e2312.

Cooper, H. (2016). *Research Synthesis and Meta-Analysis: A Step-by-Step Approach* (Fifth edition). SAGE Publications, Inc.

Darling, N., & Steinberg, L. (1993). Parenting style as context: An integrative model.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3*(3),

487–496.

De Bolle, M., De Fruyt, F., McCrae, R. R., Löckenhoff, C. E., Costa Jr., P. T., Aguilar-Vafaie, M. E., … Terracciano, A. (2015). The emergence of sex differences in personality traits in early adolescence: A cross-sectional, cross-cultural stud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8, 171–185.

Dong, Z., Zhou, S., Case, A. S., & Zhou, W. (202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Parenting Style and Social Anxiety: A Meta-analysis of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Child Psychiatry & Human Development*, 1–15.

Eysenck, S. B., Eysenck, H. J., & Barrett, P. (1985). A revised version of the Psychoticism scal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6*(1), 21–29.

*Fan, W. (2021).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ng Styles and Problem Behaviors at Chinese Migrant Children.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ng Styles and Problem Behaviors at Chinese Migrant Children*.

Friedman, H. S., & Kern, M. L. (2014). Personality, Well-Being, and Health.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5*(1), 719–742.

Guan, X., & Li, X. (2017). A Cross-Cultural Examination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s, Parent-Child Closeness, and Conflict Sty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Saudi Arabia. *Journal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17*(3), 223–237.

Harris, J. R. (1995). Where is the child's environment? A group socialization theory of develop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102*, 458–489.

Jugert, P., Eckstein, K., Beelmann, A., & Noack, P. (2016). Parents'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children's ethnic intergroup attitudes: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from middle childhood to early adolescence.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3*(2), 213–230.

Kitamura, T., Shikai, N., Uji, M., Hiramura, H., Tanaka, N., & Shono, M. (2009).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arenting Style and Personality: Direct Influence or Mediation?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18*(5), 541–556.

Lei, H., Chiu, M. M., Cui, Y., Zhou, W., & Li, S. (2018). Parenting Style and Aggression: A Meta-Analysis of Mainland Chinese Children and Youth.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94*, 446–455.

LeVine, R. A. (1974). Parental goals: A cross-cultural view.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76*, 226–239.

Li, H., Chen, C., & Zhang, Z. (2021). Are gender differences related to non-cognitive abilities?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0(0), 1–20.

*Li, M. (2021). The Contributions of Indigenous Personality and Parenting Style to Life Satisfaction Development in Chinese Adolescent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 702408.

Li, N., Peng, J., & Li, Y. (2021). Effects and Moderators of Triple P on the Social,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of Children: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

Linden, D. V. der, Tsaousis, I., & Petrides, K. V. (2012). Overlap between General Factors of Personality in the Big Five, Giant Three, and 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3*(3), 175–179.

chinaXiv:202306.00078v3

Maccoby, E. E., & Martin, J. A. (1983). Soci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Family: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 Semantic Scholar. In *Soci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Family: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 Semantic Scholar*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 4. Socializ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p. 1–101)). In E. M. Hetherington (Ed.).

Markus, H. R., & Kitayama, S. (1998).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Personality.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9*(1), 63–87.

McCrae, R. R., Costa, Jr. P. T., & Martin, T. A. (2005). The NEO–PI–3: A More Readable Revised NEO Personality Invent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84*(3), 261–270.

Minkov, M., Vijver, F. J. R. van de, & Schachner, M. (2019). A test of a new short Big-Five tool in large probabilistic samples from 19 countri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51*, 109519.

Parker, G., Tupling, H., & Brown, L. B. (1979). A 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 *British Journal of Medical Psychology*, *52*(1), 1–10.

Perris, C., Jacobsson, L., Linndström, H., Knorring, L. von, & Perris, H. (1980). Development of a new inventory for assessing memories of parental rearing behaviour.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61*(4), 265–274.

Pinquart, M. (2016). Associations of Parenting Styles and Dimensions with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Meta-analysis.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28*(3), 475–493.

Pinquart, M., & Gerke, D.-C. (2019). Associations of Parenting Styles with Self-Esteem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8*(8), 2017–2035.

Rammstedt, B., Goldberg, L. R., & Borg, I. (2010). The measurement equivalence of Big-Five factor markers for person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educatio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4*(1), 53–61.

Richards, M. P. M. (1981).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3. Loss, Sadness and Depression. By John Bowlby. *Journal of Biosocial Science*, *13*(3), 369–373.

Roberts, B. W., & Yoon, H. J. (2022). Personality Psycholog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73*(1), 489–516.

Rogosch, F. A., & Cicchetti, D. (2004). Child Maltreatment and Emergent Personality Organization: Perspectives from the Five-Factor Model.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32*(2), 123–145.

Schofield, T. J., Conger, R. D., Donnellan, M. B., Jochem, R., Widaman, K. F., & Conger, K. J. (2012). Parent Personality and Positive Parenting as Predictors of Positive Adolescent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Over Time.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58*(2), 255–283.

Shiner, R., & Caspi, A. (2003). Personality differences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measurement, development, and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4*(1), 2–32.

Shiner, R., Soto, C., & Fruyt, F. D. (2021). Personality Assessment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nnual Review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1), 113–137.

Wong, T. K. Y., Konishi, C., & Kong, X. (2021). Parenting and prosocial behaviors: A meta-analysis. *Social Development*, *30*(2), 343–373.

*Xie, Q., Fan, W., Wong, P., & Cheung, F. M. (2016). Personality and Parenting Style as Predictors of Life

chinaXiv:202306.00078v3

Satisfaction Among Chinese Secondary Students. *Asia-Pacific Education Researcher*, *25*(3), 423–432.

Zawadzki, B., & Strelau, J. (2010). Structure of personality: Search for a general factor viewed from a temperament perspectiv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9*(2), 77–82.

Zhang, X., & Wang, Y. (2022). Effects of parenting styles on gender differences of adolescents' non-cognitive abilities: an empirical study in China.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 1–14.

陈仲庚. (1983). 艾森克人格问卷的项目分析. *心理学报*, *02*, 211–218.

单志艳, 汪卫东, 吕学玉, 李桂侠, 张锦花, 冯帆. (2017). 父母教养方式、生活事件与人际关系的相互影响研究. *教育学术月刊*, *5*, 38–46.

董梦妍, 曾诗慧, 张玄玄, 尚鹤睿. (2020). 家庭教养方式与小学生人格发展的相关性.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8*(6), 900–905.

高峰, 白学军, 章鹏, 曹海波. (2023). 中国青少年父母教养方式与自杀意念的元分析. *心理发展与教育*, *01*, 97–108.

胡菲菲. (2008). *东西部两城市小学生家长教育观念的比较研究* (硕士).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黄希庭. (2017). 人格研究中国化之我见. *心理科学*, *40*(06), 1518–1523.

黄希庭, 郑涌. (2014). *心理学十五讲*. 北京大学出版社.

贾刚, 程灶火, 王国强, 杨碧秀, 周晓琴. (2015). 家庭教养方式年代变迁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24*(03), 250–254.

贾立茹, 于晨, 于少杰, 武敬亮, 田桂香. (2019). 不同家庭教养方式与大学生共情能力的关系.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7*(06), 910–914.

蒋敏慧, 万燕, 程灶火. (2017). 家庭教养方式对网络成瘾的影响及人格的中介效应.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5*(05), 907–910.

雷丽丽, 冉光明, 张琪, 米倩文, 陈旭. (2020). 父母教养方式与幼儿焦虑关系的三水平元分析. *心理发展与教育*, *36*(03), 329–340.

李骏, 张陈陈. (2021). 中国城市家庭教养方式的阶层差异：基于不同数据和测量的交叉验证. *学术月刊*, *53*(02), 139–150.

李松, 冉光明, 张琪, 胡天强. (2019). 中国背景下自我效能感与心理健康的元分析. *心理发展与教育*, *35*(06), 759–768.

刘拓, 陈雪明, 芦旭蓉, 杨莹. (2021).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对中学生应对方式的影响：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心理与行为研究*, *19*(04), 507–514.

刘文婧, 许志星, 邹泓. (2012). 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影响:人格类型的调节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28*(6), 625–633.

刘啸莳. (2021). 母亲受教育水平和青少年学业自尊的关系：母亲教养方式的中介作用和性别的调节作用. *心理与行为研究*, *19*(01), 59–65.

刘宇, 陈树铨, 樊富珉, 邸新, 范会勇, 封春亮, … 胡传鹏. (2021). 开放式荟萃分析的规范化报告. *中国科学:生命科学*, *51*(6), 764–778.

卢富荣, 王侠, 李杜芳, 王耘. (2015). 小学生学校适应的发展特点及其与父母教养方式关系的研究. *心理发展与教育*, *31*(05), 555–562.

*路静. (2013). *中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人格与宽恕倾向的关系研究* (硕士). 河北师范大学, 保定.

chinaXiv:202306.00078v3

吕玉刚. (2022). 以未来计·从足下始: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十年成就与未来布局. *中小学管理*, *10*, 10–14.

罗杰, 戴晓阳. (2015). 中文形容词大五人格量表的初步编制I:理论框架与测验信度.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3*(3), 381–385.

罗杰, 周瑗, 陈维, 潘运, 赵守盈. (2016). 大五人格测验在中国应用的信度概化分析. *心理发展与教育*, *32*(1), 121–128.

苗天长. (202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我国儿童青少年人格发展基础性数据库构建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60*(03), 2.

彭顺, 汪夏, 张红坡, 胡祥恩. (2019). 母亲外向性与青少年外向性的关系:中介与调节作用模型. *心理发展与教育*, *35*(2), 167–175.

*钱铭怡, 夏国华. (1996). 青少年人格与父母养育方式的相关研究.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02*, 58-59+94+93-94.

申荷永, 陈侃, 高岚. (2005). 沙盘游戏治疗的历史与理论. *心理发展与教育*, *2*, 124–128.

孙岩, 刘沙, 杨丽珠. (2016). 父母教养方式、同伴接纳和教师期望对小学生人格的影响. *心理科学*, *39*(2), 343–349.

孙岩, 马亚楠, 杨丽珠. (2015). 父母教育价值观对儿童人格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心理发展与教育*, *31*(5), 522–530.

檀传宝. (2019). 劳动教育的概念理解——如何认识劳动教育概念的基本内涵与基本特征. *中国教育学刊*, *02*, 82–84.

田良臣, 袁青. (2019). 高中生父母教养方式、坚韧人格与学习投入的关系——基于甘肃省三所高中的实证研究. *教育科学研究*, *06*, 33–40.

童星. (2020). 大学生学业拖延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基于我国定量研究的元分析. *高教探索*, *03*, 36–42.

*王江洋. (2006). 工读男生与普通男生人格特征及父母教养方式差异比较.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 147–149.

伍新春, 郭素然, 刘畅, 陈玲玲, 郭幽圻. (2012). 社会变迁中父亲职能的凸显: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分析.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6*, 56-62+158.

谢云天, 史滋福, 尹霖, 兰洛. (2022). 中国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学业成绩关系的元分析. *心理发展与教育*, *38*(03), 366–379.

徐鑫锫, 朱莉, 李燕, 熊佳欣. (2022). 父母教养方式与亲子关系：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的分析.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30*(6), 1423-1427+1432.

杨斌芳, 侯彦斌. (2014). 子女性别与父母教养方式之间的关系研究.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9(03), 58–61.

杨红君, 楚艳民, 刘利, 刘琴, 陈哲, 刘文莉, 钟爱良. (2009). 父母养育方式量表(PBI)在中国大学生中的初步修订.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7*(04), 434–436.

杨丽珠. (2015). 中国儿童青少年人格发展与培养研究三十年. *心理发展与教育*, *31*(01), 9–14.

杨丽珠, 高毓婉, 孙岩, 赵南. (2019). 幼儿健全人格何以养成——基于全国教育现场实验的实证研究. *教育研究*, *40*(07), 111–124.

杨丽珠, 马振, 胡金生. (2017). *6-12 岁小学生健全人格培养研究*. 大连: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杨青. (2004). 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人格发展关系之探讨.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05*, 79–83.

*余照照, 秦亚平. (2015). 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人格、拖延的关系研究及教育启示. *西部素质教育*, *1*(7), 114–115.

俞国良, 琚运婷. (2018). 我国心理健康教育政策的历史进程分析与启示. *中国教育学刊*, *10*, 40–48.

chinaXiv:202306.00078v3

chinaXiv:202306.00078v3

俞国良, 张亚利. (2020). 大中小幼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人格的视角. *教育研究*, *41*(06), 125–133.
岳冬梅, 李鸣杲, 金魁和, 丁宝坤. (1993). 父母教养方式:EMBU 的初步修订及其在神经症患者的应用.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03*, 97-101+143.
岳鹏飞, 胡文丽, 张嘉鑫, 史梦梦. (2022). 粗暴养育与中学生学习投入：状态焦虑与性别的作用.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2), 226–232.
张建人, 孟凡斐, 凌辉, 龚文婷, 李家鑫. (2021). 童年期虐待、父母教养方式、不安全依恋与大学生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9*(01), 28–32.
张小菊, 赵敬. (2013). 大学新生父母教养方式与积极心理品质关系研究. *中国特殊教育*, *01*, 92–96.
张亚利, 靳娟娟, 俞国良. (2022). 2010 ~ 2020 中国内地初中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的元分析. *心理科学进展*, *30*(5), 965–977.
张祎. (2011). *我国家庭教养方式研究的元分析* (硕士).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赵纤, 王志航, 王东方, 袁言云, 尹霞云, 黎志华. (2023). 贫困家庭儿童在青少年早期的亲社会行为发展轨迹: 性别及父母教养方式异质性的影响. *心理发展与教育*, *3*, 323-332+11.
*周春云. (2018). *高中生父母教养方式、人格特征与人际容纳的关系研究* (硕士). 四川师范大学, 成都.
周亚娟, 梁宝勇, 蔡颖, 陈坡. (2010). Buri 父母权威问卷的中文修订.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8*(01), 8–10.
祝蓓里, 戴忠恒. (1988). 卡氏十六种人格因素中国常模的修订. *心理科学通讯*, *06*, 16–20.

A met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family parenting styl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y personality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bstract: How to develop the healthy personality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s a common concern in the society, among which family parenting style has receiv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ut the findings are inconsistent.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nd its moderating mechanism, this study conducted a meta-analysis of 1054 effect values from 52 studies with 19,642 subjec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Positive parenting style i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related to healthy personality, while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 is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related to healthy personality.

(2) The effect of parenting style on healthy personality was moderated by the age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an inverted U-shaped trend of "small at the end and large in the middle," reflecting a strong influence at the junior high and high school levels, and a weak influence at the elementary and college levels. In addition, the effect of parenting style on the integrity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as also moderated by the gender, generation, and region of the childre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a scientific perspective and an empiric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sound personality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family culture.

Keywords: family parenting styl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healthy personality; meta-analysis; moderating effect

chinaXiv:202306.00078v3